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及目的

1989年12月美國總統布希（George Bush）與蘇聯總統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於馬爾他舉行高峰會議，並且在會中向全世界宣告冷戰的終結。冷戰的結束不只是重新改變國際政治體系的權力分配地位，同樣也帶給東北亞的國際政治體系不一樣的動力與影響。冷戰後美國在亞太的國際政治格局中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單極主導結構，因為其在軍事、經濟、政治、科技等層面都居於絕對優勢的地位，而繼承前蘇聯的俄羅斯因為內政以及經濟的問題使得其在東北亞地區的影響力大幅弱化，無法再與美國抗衡。相對的，日本與中共也從90年代開始，確立其東北亞區域強權的角色，日本憑藉的是雄厚的經濟實力，以及做為美國在亞太地區最重要的盟友自居；另一受矚目的國家是中共，中共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主導改革開放政策以後，經濟實力大為增強，世界銀行資料指出，以中共持續的經濟成長實力，預估到公元2035年前後，中國大陸的經濟總規模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¹伴隨著中共經濟實力的持續快速發展，綜合國力不斷提升，作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擁有核子武器，全球第五大武器出口國，第六大經濟體，第四大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存底國，日益增強的政治、軍事、經濟、科技實力，都使中共在國際社會有發揮更大影響力的空間，也促使美國及日本重新思考中國的定位。如上所述，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東北亞國際政治格局的形成與區域內強權互動有很大的關係，在此區域內強權主要包括美國、日本、中共、俄羅斯，而此四個國家依據彼此關係的變化形成了美日中，美俄中，日俄中，美日俄等四組三角關係。但是由於俄羅斯的弱化，日本、中共的崛起，使得筆者認為四組三角關係中，美、日、中三角互動對亞太地區新的利益關係與戰略結構的發展與走向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而中共面對美日兩國的競爭與合作同時，中共的外交政策又是如何來認知美日關係將成為未來的重點。

¹ 世界銀行編，*世界發展報告－1993年*（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3），頁240-243；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國的奇蹟－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5），頁7。

美日安保條約是冷戰時期美蘇對抗的產物，1951年9月美國與日本在美國舊金山簽署「美日安保條約」，並且它和美韓防禦條約、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美菲共同防禦條約共同形成遠東地區圍堵共產勢力的防線。²初期這條約的形式內容是不對等的關係，條約主要是美國用來駐軍合法化的工具，在冷戰時期美日同盟的結構可說是穩定，但是隨著1991年蘇聯的瓦解、國際與亞太情勢的改變與美日兩國關係的發展，美日安保條約逐漸轉變成兩國之間關係的重要架構，雖然仍是以軍事安全為核心，但是也擴張到作為雙方經濟、政治、文化和發展議題的結構性支柱。美日安保條約雖然被視為美國建構國際和亞太秩序的主要支柱之一，但是不同於美國和西歐國家建立的軍事聯盟，日本和美國缺乏相同的文化背景和種族聯繫，因此，美日安保條約的基礎是彼此的國家利益，是各自基於本身國家利益的總體考量，體認締結和維持安全保障條約的重要性。至於國家利益所牽涉到的範圍，除了一般所認知的軍事安全和經濟利益之外，民主制度與價值也是一項相關因素。而以時間序列方式，美日安保包括1951年安保條約、1960年修正安保條約、1978年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以及1997年新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以這四項文件為建構美日安保體系的主要架構。³

美日安保發展在2005年2月19日有最新情況，美國與日本的國防部長與外交部長在美國華盛頓舉行「2+2 安保諮商會談」，⁴在會後兩國發表聯合聲明，而在此份聲明中，在區域內共同戰略目標中首度列出「鼓勵台灣海峽相關問題透過對話和平解決」，⁵並且將台灣海峽列為美日安保共同的戰略目標。而在這份聲明中，可以看出具有下列意涵：首先是美國希望日本在東亞安全領域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以負擔美國在911事件後除了反恐戰爭以外的區域安全責任，其次是將1997年美日防衛指針「周邊有事」的模糊概念具體化。⁶而關於台海問題也變成此次聲明各方關注的焦點，隨後中共也隨即在同年3月14日中共十屆人大三次會議上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加以回應，而這次的事件，也反映出東北亞在後冷戰的格局是複雜與多

² 楊志恆，「美日安保之沿革及其對台海安全之影響」，**戰略與國際研究**，第2卷第2期(2000)，頁1。

³ 楊永明，「美日安保與亞太安全」，**政治科學論叢**，第9期(1998)，頁275-276。

⁴ 此次會談包括美國國務卿萊斯、國防部長倫斯斐，與日本外相町村信孝、防衛廳長官大野功統。

⁵ 參看網站，<<http://www.tssdnews.com.tw/daily/2005/02/21/text/940221a2.htm>>。

⁶ 蔡增家，「美日2+2 安保諮商的政治意涵極其影響」，**展望與探索**，第3卷第3期(2005)，頁1-2。

變化的，未來在東北亞的戰略焦點上，美日中三邊關係仍是東北亞國際政治的主軸，在三邊關係中，美日兩國雖然存在不平等的關係，但是長期的聯合，使得關係變動的可能性較少，因此中共如何認知美日關係，就成為三方關係的主要變項。⁷

因此美日雙方同盟關係的強化，這意味著對於中共來說是一項警訊，基本上它衝擊到中共的國家利益，以及美國和日本對中共的意圖，而中共對美日關係的強化有下列幾項憂心的範疇：

（一）中國威脅論

從 1990 年代初期，許多美日學者就倡導中國威脅論，而美日兩國對於中共的外交政策思維也一直在在兩極迴盪著，到底是「交往」(engagement) 或「圍堵」(containment)，⁸在交往思維下如何改變中共的政體，一直是美國理想主義者不曾放棄的目標，冷戰在結束時，不論它的真正原因為何，美國人多願將答案置於西方價值觀的勝利，最具代表的學者是曾任美國國務院官員的福山 (Francis Fukuyama)，福山借用黑格爾 (Hegel) 的「歷史終結論」的概念，認為西方自由民主政治將成為人類政府的終結形式。⁹不論歷史的進程是否如同福山所說的那麼容易，但是福山的觀點畢竟反映出，在冷戰勝利後，美國人對西方價值觀高度自信與自傲。而中國的崛起也促使美國思考著中國是否能融入國際社會和走上民主？而圍堵政策則是在冷戰後蘇聯瓦解，對美國和西方的戰略設計家和軍事、情報的領袖而言，一項迫切而重要的任務，即是要尋找一個新的假想敵。而在現階段中，鑑於感受到中共對美國日增的威脅，美國許多國會議員、保守派媒體工作者和卸任的情報官員及戰略學家，都主張為了預防中共作大，應該對中共採行全面圍堵的政策。

或者是運用更新的「圍和政策」(congagement)，¹⁰一是促使中共走向民主和國際合作，二是萬一中美交惡時能維護美國利益，設計此一政策的分析家認為，美國與中共交往最好的策略，是採取交往和圍堵混合的「圍和政策」，亦即美國政府既

⁷ 邱坤玄，「中共對冷戰後美日安全關係的認知與新安全關的形成」，*東亞研究*，第 35 卷第 2 期 (2004)，頁 4。

⁸ 季辛吉 (Henry Kissinger) 曾說，制訂美國外交政策的過程就是在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間尋求平衡的過程。Henry Kissinger, "Reflection on Containment," *Foreign Affairs*, Vol.73, No.3 (1994), p.118.

⁹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s*, No.16 (1989), p.4.

¹⁰ 「圍交政策」主要係由蘭德公司 (Rand) 提出，Zalmay Khalilzad, Mark Bernstein, Hassell, Scott Lempert, J Robert and John Godges, *Rand Review*, Vol.23, No.3 (2000).

無法也不須避免與中共在政治和經濟上交往，但交往時不能一廂情願，必須顧及美國的國家利益，需預防圍堵中共。

因此中共對美日同盟的認知就有非常重要的意涵，而歷經 911 事件後，美國對中共雖做出友善的動作，但此次美日聯合聲明又侵犯到中共的痛處，主權問題中的台灣，而這也影響到中共往後的外交決策。

（二）日本邁向正常國家

對於日本的安全和外交政策，有著許多層面的因素相互影響著，其中在內部因素影響有：政黨政策的影響、經濟不景氣下所採生的不安全感、日本內部探討是否要邁向一個正常普通國家的問題以及日本在經濟及軍事的實力；在外部因素的影響有：日本評估外在的威脅，如北韓的核武危機及中國的崛起，美國在日本外交上所能發揮的影響。¹¹而在東北亞的國際政治格局中，中共和日本都是現行的大國，因此兩國的互動關係和認知對東北亞國際情是有著決定性的影響作用。

中共和日本之間有著歷史性情仇，近來中日雙方又有關於日方竄改教科書及釣魚台領土的爭議，加上雙方面對於其軍事力量都抱著互不信任的態度，尤其日本近來的戰略步驟是邁向一個正常普通的國家，並且運用本身的經濟實力發揮國際影響力，並極力爭取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席次；¹²中國則是極力發展經濟和軍事實力，企圖站穩在東亞的第一強權地位。但另一方面，中共和日本又有著密切的經貿關係，因此，兩國在互動交往上呈現政治冷、經濟熱的情況。¹³

但中國基於兩國歷史因素及害怕日本再度變成一個軍事大國，因此對美日同盟強化，一直有著蛋殼理論的辯爭，認為日本有朝一日將破殼而出，威脅到中共的安全利益。¹⁴

（三）戰區飛彈防禦系統

隨著美國協助日本部署飛彈防禦系統的可能性大增，中共擔憂美日聯手在軍事

¹¹ Denny Roy, "Stirring Samurai, Disapproving Dragon: Japan's Growing Security Activity and Sino-Japan Relations," *Asian Affairs*, Vol.31, No.2 (2004), pp.86-96.

¹² Bhubhindar Singh, "Japan's Post-Cold War Security Policy: Bringing Back the Normal State,"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24, No. 1 (2002), pp.82-105.

¹³ Denny Roy, "The Sources and Limits of Sino-Japan Tensions," *Survival*, Vol.47, No.2 (2005), pp.191-207..

¹⁴ Paul Midford, "China Views the Revised US-Japan Defense Guidelines: Popping the Cork?,"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sia Pacific*, Vol. 4 (2004), pp.113-145

上遏制中共的目的。大部分中共的官員及分析家認為刺激日本國家利益在TMD計畫的最重要因素，除了面對北韓的飛彈威脅外，另一是日本對中共意圖的不確定感。而2001年美國發生的911恐怖攻擊事件和美國發動的「反恐戰爭」，觸動了各國調整對外戰略與安全政策，大國合作與區域問題焦點出現了新的動向進而亞太情勢出現了新的變化，而國際格局則醞釀著自冷戰後又一波的調整。上述中共對美日安保體制強化的幾項關切範疇，也因為國際局勢變化而有了新的挑戰，2001年10月美國所發表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經中共方面學者的解讀後，認為美國是藉反恐和彈道飛彈防禦以增加美國的火力，同時將軍事重點轉移到太平洋以抑制中共。

(四) 台灣問題與朝鮮半島問題

在美日同盟強化的過程中，其兩國的戰略目標範圍一直是中共的焦點，從1997年美日安保新指針的「周邊有事」到今年的美日聯合聲名戰略範圍具體化，都跟中共有著切身利害關係。在台灣問題，則涉及到中共最核心的利益——主權；至於朝鮮半島上，中共一直是具有影響力的行為者之一，而美國也想藉由中共在朝鮮半島的影響力處理北韓核武危機問題，對此中共處在北韓與美國之間微妙的平衡位置，因此在美日同盟強化的過程中，中共如何處理北韓核武議題將是與美日兩國爭取談判籌碼的重要力量。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成為經濟發展較快、綜合國力迅速增強的國家。外國學者把中國的快速發展形容為「崛起」。尤以西方學術界早已進行中國崛起的相關討論。而多數探究中國崛起之相關文章，皆表達了對中國崛起後會謀求地區霸權甚至全球霸權，從而挑戰美國的地位，此即為「中國威脅論」，不僅在美國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也引發了亞洲地區的不安或憂慮。然而，鑑於中國威脅論之興起，中共高層便以「中國和平崛起」來撫平或降低各國的憂慮。

在經歷中共16大的人事調整之後，中國正在進行一場國際戰略的「和平轉型」。中國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美國室主任楊潔勉最早使用「和平轉型」的概念來形容國際關係的現狀，他認為目前世界呈現出多極化的趨勢，國際關係的主題也從超級大國之間不可調和的競爭以及近乎零和的遊戲，轉變成為民族國家對民主、和

平和發展的關注。上海復旦大學美國中心孫哲也同樣使用這個概念，來指涉中國16大以後中國外交發展的趨勢。¹⁵在中共16大報告中有關「國際形式和對外工作」部分，曾提出一個「和平與發展」的主軸，並總結8條對於國際和外交工作的具體經驗，以及以「四個主張」和「六個繼續」作為中國新時期外交工作的指示。¹⁶16大報告不但呈現中國共產黨正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也呈現出中國政府試圖從「戰時革命體制」的國家，向法理型的「現代體制」國家轉變，中國的國際戰略觀已經改變，國家身份定位以及具體的對外政策行為模式。¹⁷

2003年11月3日，中共中央黨校前副校長鄭必堅曾在海南島召開「博鰲亞洲論壇」，針對「中國的和平崛起」，進行專題演講；同年12月10日，中共總理溫家寶在哈佛大學的演講，亦對「中國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做出綱要性的闡述。自此之後，中共的「和平崛起」論，即被定位為新的國家發展戰略，而深受各國與各界的矚目與討論。¹⁸中共的國家發展戰略，向來深受國際政經變遷的影響，而且亦左右其對內與對外的政經政策。從1978年底開始推動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的內外政經結構與內外政經關係，早已出現非常劇烈的變化。25年來，在國內層次，誠如2003年12月溫家寶在哈佛大學的演講中所說的，中共已吸收、運用五千億美元的外資，而且達成平均9.4%的高經濟成長率，並因而經歷激烈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上的變遷。另一方面，在國際層次，1980年代末後的冷戰終結與蘇聯的解體、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2001年的911事件，及2003年的美伊戰爭等，亦分別衝擊中共的國際政經關係，並影響其國際政經地位。加上東亞地區有著潛在的軍事衝突，包括位於東北亞的朝鮮半島核武危機、東亞中介區域的台海兩岸軍事衝突以及東南亞

¹⁵ 楊潔勉，後冷戰時期的中美關係：外交政策比較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頁38；孫哲，「結構性導航：中國『和平崛起』的外交新方略」，**世界經濟與政治**，第280期（2003），頁58。

¹⁶ 所謂「四個主張」為順應歷史潮流，維護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維護世界多樣性，提倡國際關係民主化和發展模式多樣化；並且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六個繼續」為繼續改善和發展同發達國家的關係；繼續加強睦鄰友好，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加強區域合作；繼續增強同第三世界的團結和合作；繼續積極參與多邊外交活動；繼續堅持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原則；繼續廣泛開展民間外交。
江澤民，「江澤民在黨的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網**，2002年11月8日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11/17/content_693542.htm>。

¹⁷ 馮玉軍，「2003年中國外交」，**現代國際關係**，第12期（2003年），頁37。

¹⁸ 劉藝、王曉玲，「對中國崛起的思考」，**當代亞太**，第2期（2005），頁1-2。

的南海領土主權爭議等等。而這些潛在的軍事衝突，背後有著強權大國的利益糾葛，此外也涉及到複雜的歷史因素及不同人文背景。¹⁹

為因應這些劇烈的內外政經變遷，中共會調整其國家發展戰略；這似乎是很自然的例行公事。另一方面，這個理論之由來，是因鄭必堅在2002年末訪問美國，與美國政要交換意見，發現「中國威脅論」論調之嚴重而感不安。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下令，由前中央黨校副校長鄭必堅帶領的理論班子，全力建構「和平崛起的中國」理論，成為新的國家發展戰略。

但和平崛起的論調許多學者都認為中共官方2004年4月之後都不再提和平崛起的論調，其中包括 Robert Suettinger 在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2004 年秋季號所題得文章、²⁰東京新聞撰述委員清水美和 2004 年 11 月 20 日在第七屆亞太發展論壇的論文及陳冬在《明報》上的「和平崛起論重獲新生」，²¹而這些文章都認為主要是中共內部及江澤民派的反對。而其中也表示和平崛起面臨了三項問題：1、崛起的本身是權力政治的概念，對於其他國家有威脅感的產生；2、中國是否真的已經崛起？3、在鄧小平江澤民時期是強調和平發展，而和平發展一直是中共改革開放所強調的外交主軸，其本身也沒多大的問題，為何要新提一個和平崛起來替代之前的論述。這也說明和平崛起在中共中央的侷限性，但中共官方又不禁止民間及學術界討論和平崛起的問題，而這也表示中國外交理論有走向內部多元討論的開始。顯然地，胡溫體制第四代領導班子並不完全放棄和平崛起做為其中共的外交戰略主軸，想反地，胡江體制在逐漸鞏固其內部權力結構，並且解決認定美國霸權與中國發生衝突的必然性，加上中美雙方不觸碰到中共敏感的台灣議題，和平崛起論似乎在未來還有可能重見陽光。

而中共的「和平崛起」也是繼「大國外交」及「新安全觀」之後最新提出的中共外交政策新概念，這概念中到底對中共有著什麼樣的戰略意涵，而它又會對中共的外交政策有著怎樣的指導作用將是我們想瞭解的重點。

冷戰時期的美日同盟關係主導東亞安全戰略情勢的發展，但美日同盟關係在冷

¹⁹ 蕭全政，「論中共的和平崛起」，*政治科學論叢*，第 22 期（2004），頁 1-4。

²⁰ Robert Suettinger, "The Rise and Descent of Peaceful Rise,"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12 (2004), pp.1-8.

²¹ 高國鼎，「和平崛起與新思維」，*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第 68 期（2005），頁 8-9。

戰後不但沒有消失，反而藉由其之後條約的強化分別來達到美日兩國的國家利益，而面對東亞的另一新興強權－中共，美日兩國的同盟及戰略部署帶給中共的戰略意涵是什麼？至於中共對美日安全同盟的認知，其新興的外交思維「和平崛起」又怎樣與美日關係競爭與合作，以及其後續發展情況會如何？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探討以下重要問題：

- (一) 美日安保在各個階段的實施情況為何，以及它所代表的內涵及對美日兩國有何影響？
- (二) 冷戰前後的國際世界格局有何改變，並且對東北亞有何影響？我們可以從中歸結出什麼樣的總體性指標？並且在另經國際性的變動，如911事件、朝鮮半島核武危機及台海安全問題等等，中共對美日安保的認知有何轉變，並且在經由認知之後產生怎樣的行為與政策。
- (三) 如果將中共如何認知美日安保的問題，納入在東北亞的區域國際關係體系中，並且加入探討影響到美日中三角關係的議題，如台灣與朝鮮半島問題、戰區飛彈防禦問題與日本邁向正常普通國家議題等等，會有何不同面向的評價與觀點？
- (四) 如果從外交政策面向出發，探討冷戰後中共提出新型外交概念的目的，並且著重在胡溫體制下「和平崛起」的外交政策，那它與美日安保同盟體系有何關係與影響？並試圖觀察彙整出中共對外行為的原則、方法與手段。

本論文共分爲七個部分，第一章爲前言，包含論文之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論文架構以及相關文獻之回顧。

第二章爲針對論文主體的歷史鋪陳，重點在於回顧冷戰時期美日安保體制變遷及中共的對策。筆者於此章中將分析冷戰初期，美日、中蘇相互結盟的對峙背景下，中共對美日安保的態度。及其後中共歷經1960年代與美蘇兩大強權同時對立，國內文化大革命運動高張，相較於前期的美日安保觀之變化。又中美於1970年代初達成和解的共識，再加上1972年中日達成邦交正常化，中美日三方於此時將蘇聯視爲共同的敵人，中共對美日安保體制的基本態度有了重大轉變，其中的原因爲何？則是本章分析的重點。

1982年中共提出「獨立自主」外交路線，其政策產出背景及背後訴求及目的爲何？又對中共的美日安保觀產生何種衝擊？進入1980年代中期，中美、中日兩組雙邊關係發生摩擦，原本即潛在的對立有深化的趨勢，這又會對中共的政策產生什麼影響？上述問題皆爲本章所要探討的重點，也是對於本論文主體的基本歷史回顧。

第三章爲探討「和平崛起論」，首先對中共「和平崛起」的背景、內容跟目的做一闡述，再來是對中共和平崛起的能力做評估，這部分會從中共的經濟、軍事以及外交能力看待中共崛起的指標。第三部分則針對「和平崛起論」做爲中共最新的外交政策概念，中共提出「和平崛起論」的戰略意涵爲何？對現狀的國際體系造成什麼影響？以及對亞太區域所帶來的衝擊與挑戰爲何？

第四章要探討的是冷戰後美日安保體制從「漂流」到強化的過程，以及中共對此時期美日同盟的認知爲如何？冷戰的終結，意味著美日安保體制及中共將蘇聯視爲假想敵此一合作基礎的消失，而1990年代美日安保體制的合作基礎亦遭受挑戰，其從「漂流」到強化的歷程內外部動因爲何？爲本章分析之焦點所在。本章將先介紹冷戰後的國際體系之特徵以及大國關係的變化，接著以1996年「美日安保聯合宣言」及1997年「美日防衛合作新指針」此兩項美日安保同盟體制之重大變化爲子題，闡述聯盟強化的背景及動機。最後探討探討中國的崛起對美日同盟的威脅，此部分著重在中國軍事能力的增強，會對中共的陸、海、空軍做一簡單性的戰略描述，以及美日同盟對此的評估。

第五章則是探討中共崛起對美日同盟的挑戰，主要分爲三部分探討，第一部份

為對美國在區域領導權的挑戰，第二部分為對日本成為亞太正常國家的挑戰，第三部分為對台灣發展與安全的挑戰，既然中共崛起對美日會造成挑戰，反之，美日兩國或區域內對於中共的崛起也會心存戒心，第六章則是探討中共和平崛起的困境，其中包含美日同盟、區域內的反應以及台灣發展對中共和平崛起所帶來的困境做一討論。

最後，第七章為結論，也就是為本論文研究做一個總結，而研究發現了三個主要方向，第一是美日安保發展的過程，以及它所帶給美日兩國的意義與戰略價值；第二是中共對美日安保的評估；第三是從中共外交政策面向出發，探討冷戰後中共提出新型外交概念的目的，並且著重在胡溫體制下「和平崛起」的外交政策，那它與美日安保同盟體系有何關係與影響？並試圖觀察彙整出中共對外行為的原則、方法與手段。

第二節 文獻回顧

一、從亞太安全層次探討中國的角色地位

亞太安全研究最近幾年出現了以前沒有過的大辯論，因為他觸及了亞太安全研究的根本核心，也就是亞太地區是朝向和平？還是朝向戰爭？最初挑起這個議題的是 Aaron Friedberg，他的基本論述認為亞洲的冷戰結束得很慢，基本上還是相當程度存有冷戰的格局，未來還是有很多的爭端。²²David Kang 接著在 2003 年發表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導引出更多的討論，他的基本主張是：1.亞洲國家在後冷戰時期並沒有如 Friedberg 及其他學者的預測，成爲一個爭端充斥的場所，西方國家的學者顯然過於悲觀，亞洲國家基本上是和平的。2.中國在歷史上維持一個階層化的亞洲秩序，今天的中國再度成爲亞太的中心，一個富強、安定的中國可以確保安定的亞洲。3.亞洲國家有附從於中國的現象。²³Kang 的文章相當有挑戰性，但也引發許多爭論，最具代表的是 Amitav Acharya，他認為有以下幾點：1.亞洲國家並沒有附從於中國，印度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2.歷史上的中國不是和平的，中國對越南就是例子。3.亞洲國家是害怕中國崛起的，基本上亞洲要維持和平，主要是經濟互賴以及區域的自主典範、機制來運作。²⁴

此外 Gerald Segal 的文章分析中共的限制，指出學術界對於中國的角色過分誇大，這樣的分析在西方學界是比較少有的。²⁵Robert Ross 則認為中共在先天的環境之下和美國只會維持和平的策略，因爲一個是海權國家，一個是陸權國家。²⁶David Shambaugh、Foot 及 Johnston 則是給予中共較爲正面的評價，其中強調中共的角色責任，並且從中國友善與周邊國家交往及積極參與國際組織上，中共基本上是安全的，並且在現今的國際政治環境中，中共區域實力的增強的結果並不是就相對代表美國或其他國家在其區域內實力的減退，現今的環境並不是一種單純的零合遊戲，

²² Aaron L.Friedberg, "Ripe for Rivalry: 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8, No.3 (1993), pp.15-33.

²³ David Kang,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7, No.4 (2003), pp.57-85.

²⁴ Amitav Acharya, "Will Asia's Past Be Its Fu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8, No.3 (2003/2004), pp.149-164.

²⁵ Gerald Segal, "Does China Matter?," *Foreign Affairs*, Vol.78, No.5 (1999), pp.24-36.

²⁶ Robert S.Ross, "The Geography of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3, No.4 (1999), pp.81-118.

在許多益提及場合上還是可以追尋其共同的利益合作。²⁷此外學者 Roy 和 Sutter 則認為中共在區域上是潛在的威脅者，其表現在中國不斷擴張其軍事力量，在領土問題上缺乏溝通妥協的能力，其新安全觀的政策思維主要用來突破美國的封鎖，並且中國試著運用非對抗手段平衡美國的權力。²⁸

二、從美日安保的角度

美日安保條約跨越冷戰和後冷戰時期，其內容的產生和延續一直受到國際局勢的影響以及美日兩國的國內政治經濟層面制約。大多數文章從美日安保條約的沿革發展做一縱向描述，其中包括每時期的條約內容以及新任務等，並且在其新內容中賦予美日兩國新的戰略意涵及功能性作用，包括1951年美日安保條約、1960年修正美日安保條約、1978年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以及1997年美日防衛合作新指針，以這四項文件為建構美日安保體系的主要架構。並從美日安保的觀點，與其區域政治作連結性掛勾，以美日安保條約內容的轉變將會對區域政治及國家間安全產生影響作用為主體，其中涉及到亞太安全形勢，以及一國對另一國的外交政策行為產出做大範圍國際層次面描述。²⁹另外也有從安保觀點探討台灣安全問題，尤其是每一時期的安保條約的防衛範圍和台灣問題有何互動性。³⁰也有學者指出，美日安保體系若只是單從國際體系層面及戰略因素已經無法全面了解其轉變的原因與全貌，並且運用新自由制度主義探究美日安保條約隱含著什麼樣的政經意涵？以及美國和日本之間

²⁷ David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9, No.3 (2004/05), pp.64-99 ; Rosemary Foot, "Chinese Power and the Idea of a Responsible State," *The China Journal*, No.45 (2001), pp.1-19 ; Iain Alistair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7, No.4 (2003), pp.5-55.

²⁸ Denny Roy, "Hegemon on the Horiz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3 (1994), pp.149-168 ; Robert G. Sutter, *China's Rise in Asia: Promises and Perils* (Lanham Maryland: Rowman& Littlefield, 2005).

²⁹ 參考楊永明，「美日安保與亞太安全」，*政治科學論叢*，第九期（1998），頁 275-304；曉光，「冷戰後日美安保體制的調整及其對亞太地區和中日關係的影響」，*東亞季刊*，第 30 卷第 4 期(1999)，頁 69-90；張隆義，「從安保觀點看冷戰後日本對中共的政策」，*問題與研究*，第 38 卷第 1 期(1999)，頁 1-15；Soeya Yoshihide, "The Japan-U.S. Alliance in a Changing Asi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10, No.4 (1996), pp.265-275 ; Dennis Van Vranken Hickey, "The Reversed US-Japan Security Guidelines: Implications for Beijing and Taipei," *Issues & studies*, Vol. 34, No. 4, (1998), pp. 72-100.

³⁰ 宋學文，「從美日新防衛合作指針與三不政策探討台灣對中共之安全策略」，*戰略與國際研究*，第 1 卷第 4 期(1999)，頁 21-54；楊志恆，「美日安保之沿革及其對台海安全之影響」，*戰略與國際研究*，第 2 卷第 2 期(2000)，頁 1-30。

存在著何種制度來調節兩國之間的關係。其中不僅涉及到美日兩國的國際安全戰略利益層面，同時也必須考量到國內政經層面。³¹此外，也有從安保觀點看日本邁向普通國家做為主體，從美日安保條約中日本相關法案的通過，評估日本的國內政治與國際地位的影響。³²

三、從美日中三邊關係的角度

美日中三邊的關係是冷戰後才被提出的問題，特別是蘇聯瓦解後，中共在綜合國力提升之際，美日中三邊的關係取代冷戰時期的中美蘇三角關係。而在大多數出版的相關著作中，多數是對美中、美日及中日之間的雙邊關係上做分析，此類的分析依其歷史作時間序列的描述，³³但缺乏理論的應用與檢驗。在寫作的內容上，通常以時間作為劃分的對象，並且在每一時期當中，以重要議題的方式呈現雙方關係的轉折或影響。

另外也有學者類似採用 Lowell Dittmer 於冷戰時期分析美蘇中戰略三角關係所使用的戰略三角的概念來分析美國、日本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在傳統研究國際關係與外交政策的理論中，戰略三角多用來描述美國、蘇聯與中國在冷戰時期的互動模式。模式中說明華府、莫斯科、北京三者的關係是相互牽連，任何一國的安全繫於另外兩個國家之間的關係。然而 90 年代以後美、日、中三角關係與美、蘇、中三角關係在結構上有很大的類似性。在這兩組三角互動中，基本上每一個行為者都是以本國的安全利益當作對外政策上最重大的考慮因素，並且清楚的認知到三邊關係彼此是相互影響的。³⁴學者 Robert Ross 亦曾撰文指出，影響美日中三邊關係主要有四

³¹ 蔡增家，「美日安保條約的政經意涵與制度的調適」，*問題與研究*，第 37 卷第 9 期(1998)，頁 1-18。

³² 葉國興，「日本邁向日美同盟下的普通國家-評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相關法案的通過」，*戰略與國際研究*，第 1 卷第 3 期(1999)，頁 43-73；張隆義，「冷戰後日本防衛政策的轉變與亞太安全」，*問題與研究*，第 35 卷第 7 期(1996)，頁 1-15。

³³ 張蘊嶺，*夥伴還是對手—調整中的中美日俄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 202-304；劉建飛，*敵人、朋友還是夥伴—中美日戰略關係演變(1899-199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楊紫函等譯，*美日聯盟—過去、現在與未來*(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1)；許志嘉，「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對中共政策之調整」，*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3 期(2003)，頁 79-99；陳一新，「後冷戰時期美、日、中共關係的調整」，*問題與研究*，第 34 卷第 6 期(1995)，頁 1-25；Aaron L. Friedberg, "11 September and the Futur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urvival*, Vol. 44, No. 1 (2002), pp. 33-50.

³⁴ Lowell Dittmer,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n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Vol. 33, No.4(1981), pp.485-516.

項因素，分別為三國的力量分配、三角當中的威脅觀、第四方的威脅觀以及外交政策的利益和衝突去評估，從而發展出三種不同類型的三角關係：1.二對一的穩定聯盟，其中兩國合作取得最大利益，第三國想從中削弱卻難以成功；2.穩定的三角，三國之間並無明顯衝突，雖然有可能因為利益或政策上的差異而導致問題之產生，但還不至於影響到穩定的關係；3.不穩定的三角，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敵對競爭，彼此產生威脅或不安全感。³⁵

四、從中共軍事安全層面看與美日兩國之間的關係的角度

冷戰結束後，中共在地緣戰略上進一步從內陸走向海洋，並繼續推動軍事現代化，此種態勢明顯導致美國及亞太國家的不安，致使中國威脅論聲浪高漲。為卸除亞太國家的安全疑慮，中共在 1995 年後不斷強調其國防政策是防禦屬性，企圖為軍事行為，以及軍事現代化發展做一個明確界定，但是在中國威脅論的影響下，³⁶中共與美日兩國的關係呈現圍堵和反圍堵的對抗思維上。³⁷

另外也有學者將安全困境理論用於分析東北亞安全上，安全困境理論認為，在一個不確定和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系統中，兩個或多個國家因為不信任，而激起防禦性的措施，產生了攻擊性的威脅，而如何來解決東北亞的安全困境以及建立信心安全措施將成為其區域內的重點，而這情況特別適用於中國面對美日同盟體系的解釋。³⁸

在東北亞特定議題上也影響著美日中三國的關係，例如台灣問題、朝鮮半島問題、中國中心論、美日同盟的關係、東南亞問題等，在各項的議題中存在著間接與

³⁵ 任曉、胡泳浩，**中美日三邊關係**（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頁 4。

³⁶ 中國威脅論可參考，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Mo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American," *Foreign Affairs*, Vol.76, No.2 (1997), pp.18-32; Ross H.Munro, "Awakening Dragon: The Real Danger in Asia is From China," *Policy Review*, No.62 (1992), pp.10-16.

³⁷ 張雅君，「世紀之交中共的軍事政策與亞太安全：防禦取向的模糊性探討」，**中國大陸研究**，第 42 卷第 3 期（1999），頁 25-43；陳永康、翟文中「中共海軍現代化對亞太安全之影響」，**中國大陸研究**，第 42 卷第 7 期（1999），頁 1-20；顧立民，「新世紀中共地緣戰略思想」，**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3 期（2003），頁 57-75。

³⁸ 林文程，「中共對信心建立措施的立場及做法」，**戰略與國際研究**，第 2 卷第 1 期(2000)，頁 95；林正義，「東協區域論壇與南海信心建立措施」，**戰略與國際研究**，第 2 卷第 1 期(2001)，頁 21-42。Thomas J.Christensen, "China,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1999), pp. 49-80.

直接的影響力。³⁹其中學者 David Lampton 指出，造成東北亞軍備競賽的主因有三項，分別是台海情勢的緊張關係、中共及美國的飛彈防禦部署及日本正常化問題。⁴⁰

Glenn Snyder 則運用同盟理論來探討美日安保和第三國的關係，Glenn Snyder 指出，在國際體系中，國家為何要以結盟來維護國家安全，他以體系結構、關係、互動及單元四個環境要素，來觀察同盟的形成和運作，首先 Snyder 認為國際體系是屬於無政府狀態，在安全競逐的體系中，國家為了增進自身的安全，向外尋求結盟或建立合作關係，其安全同盟最主要的利益在於增強對敵國嚇阻力以及增強本國防衛能力；主要代價為被迫捲入戰爭的可能性，限制自身的政策行動等。所以國家會在避免被拋棄及避免被捲入中這兩個「安全困境」中尋找最適點。⁴¹進而評估同盟的利益及缺點。

五、從中共外交決策形式評估中共外交行爲

在研究中共對外外交政策中，許多學者想嘗試運用一種有效的途徑去試圖解釋中共外交政策的產出，從現有的文獻來看，西方學者，對中共外交研究的報告與專注頗多，且研究的範圍與方法也較為多元，而兩岸的研究學者也強調研究方法的分析和運用，但相較之下，西方式較為有系統的分析 and 運用。基本上，歷史文化、意識型態、決策領袖個人、國家利益研究途徑，是 1960 年代中共外交政策研究的主要學派；1960 年代末到 1970 年代，戰略三角及派系政治研究成爲中共外交政策研究的主流，國際體系結構研究途徑也有學者重視；1980 年代以後，許多學者採用決策系統與國內外多元因素途徑來研究中共外交政策。⁴²

而以下從自己檢閱的文獻包括有：1、從歷史與意識型態，在歷史因素方面，從天朝的概念延伸，而周邊國家以政治與文化屬國的朝貢體系，意識型態則著重在

³⁹ Morton Abramowitz and Stephen Bosworth, "Adjusting to the New Asia," *Foreign Affairs*, Vol.82, No.4 (2003), pp.119-131.

⁴⁰ Michael J.Green, "Defense or Security? The U.S.-Japan Defense Guidelines and China," Edited by David Lampton, *Major Power Relations in Northeast Asia* (Tokyo: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2001), pp. 73-86.

⁴¹ 柯玉枝，「日本安保政策與日美同盟」，朱松柏編，*新世紀亞太情勢與區域安全*（台北：政大國關中心，2003），頁 139-164。

⁴² 許志嘉，*當代中共外交政策與中美關係*（台北：生智出版社，2004），頁 4-5。

馬列主義的世界觀。⁴³、從國內政治，認為中共外交政策的形成大致分成四個層面，包括中共領導者、領導者的智囊、不同系統的橫向聯繫機制及其他與外交有關的正式機構。⁴⁴、個人決策，中共的政治體系是以一代一代的權力交替所形成，每一代的領導人都有其特質，其也反映在外交決策的產出上，因此在外交政策傾向、政策判斷及對國際體系的觀點也會有所不同。⁴⁵、國際體系與經濟互賴的影響，此途徑認為中共外交受其國際格局的影響甚大，其中也涉及到中共對其世局的評估，並且在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下，增長中的經濟互賴正在對中共外交行為形成一明顯制約，經濟互賴不只是引導中共對國際政治性質認知的根本轉變，也引導中共的對外政策出現更多的合作行為。與前項認知相反的是，但中共也可以保留外交政策選項的彈性，包括合作與不合作。⁴⁶

六、從中共崛起探討亞太安全角度

孟儒（Ross H. Munro）在 1992 年秋季刊的《政策研究》（Policy Review）期刊發表一篇名為《正在覺醒的巨龍：亞洲真正的威脅來自於中共》（Awakening Dragon: The Real Danger in Asia From China）的文章，該文開宗明義指出，自拿破崙以來，西方國家不斷預言，一旦「中國龍」（China Dragon）覺醒，全世界將為之震驚。經過一個多世紀的努力之後，中共走上經濟發展的道路，再經是領域也開始鋒芒畢露，雖然還不能斷定中共將取代前蘇聯而成為美國的新敵人，但是，無論在經濟立意與安全利益方面，中共將對美國構成越來越大的威脅。⁴⁷

⁴³ Michael Hunt,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Harry Harding,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80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42; Steven Levine, "Perception and Ideology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Edited by Thomas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China's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36-46.

⁴⁴ David Bachman, "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Edited by Samuel Kim, *China and the Worl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aces the New Millennium* (Boulder, Cole.: Westview Press, 1998), pp. 34-54.

⁴⁵ H. Lyman Miller and Liu Xiaohong, "The Foreign Policy Outlook of China's Third Generation Elite," Edited by David Lampton,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23-150.

⁴⁶ Michael Ng-Quinn, "International Systems Constrains o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Edited by Samuel Kim, *China and the Worl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aces the New Millennium* (Boulder, Cole.: Westview Press, 1998), pp. 93-105.

⁴⁷ Ross H. Munro, "Awakening Dragon: The Real Danger in Asia is From China," *Policy Review*, No. 62 (1992), pp. 10-16.

前紐約時報記者克里斯托夫（Nicholas D. Kristof）在 1993 年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期刊發表《中共的崛起》（*The Rise of China*），認為中共到了 21 世紀上半期的經濟會超過美國而居世界第一位。按照增長的速度，中共將與美國、日本、歐洲並列為世界四極之一。中共的經濟成長將對世界經濟產生一些負面的影響，例如全球性原料特別是石油供應短缺，以及生態環境惡化。而根據「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arity power, ppp*）來估算，中共的國防支出以高達 900 億美元。龐大的國防預算使得中共購買高科技先進武器，強化中共國防戰力。克里斯托夫也擔心，在太平洋和遠東出現權力真空，中共將會獲得戰略機會去擴大他在此區域的利益。文章的結論提到國關問題之一就是「國際社會如何容納新興強權的雄心」，如過中共能夠持續維持經濟成長，那麼僵是未來數十年裡國際關係最重要或最危險的任務之一。⁴⁸

這兩篇文章發表之後，西方學界掀起了中共崛起的論述浪潮，著作一般而言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探討中共崛起對美國的影響，較具代表性的著作，主張中共對美國構成威脅者如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和孟儒（Ross H. Munro）合著的《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⁴⁹另一方面，持否定論者如傅高義（Ezra F. Vogel）主編的《與中國共處：21 世紀的美中關係》（*Living with China: U.S. – 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 Century*）。⁵⁰至於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則從文明衝突的角度來間接詮釋中共的崛起。第二類，探討中共崛起對亞洲地區的影響，2000 年 3 月 7-8 日，美國國防大學「國際戰略研究所」（INSS）舉辦一項名為「中共崛起構成的挑戰：亞洲觀點」（*Asian Perspective on the Challenges of China*），與會人員包括來自中國大陸、印度、日本、南韓等亞太的學者專家，可謂探討中共的崛起對亞洲地區影響之代表。⁵¹第三類，則肯定或否定中共的崛起，肯定的代表有大前研一的《中國，出租中》和《力用中國》，⁵²否定的為章家敦（Goldon G. Chang）

⁴⁸ Nicholas D. Kristof, "The Rise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6 (1993), pp. 59-74.

⁴⁹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of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7).

⁵⁰ Ezra F. Vogel, *Living with China: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W.W. Norton, 1997).

⁵¹ Asian Perspective on the Challenges of China. <<http://www.ndu.edu/inss/symposia/pacific2000/agenda.html>>

⁵² 大前研一著，許曉平譯，*中國出租中*（台北：天下雜誌社，2002）；大前研一著，張新琦譯，*力用中國*（台北：天下雜誌社，2003）。

著的《中國即將崩潰》(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⁵³相較西方國家對有關中國崛起的討論，中共除了極力否定「中國威脅論」，還提出「和平崛起」的說法，強調中共不會走上擴張霸權謀求崛起的道路，中共只是和平崛起。中共總理溫家寶也說明了「和平崛起」的要義：第一、中共的崛起就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時機，努力和發展壯大自己，同時又以自身的發展，維護世界和平。第二、中共的崛起應把焦點放在自己的力量，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廣闊的國內市場，充足的勞動力資源和雄厚的資金，以及改革帶來的機會創新。第三，中共的崛起離不開世界，中共必須堅持對外開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同世界一切友好國家發展經貿關係。第四，中共的崛起不會妨礙任何人，也不會威脅任何人，中共現在不稱霸，將來即使強大也永不稱霸。⁵⁴

中共學者閻學通指出，迄今研究「中國崛起」與戰爭可能性的論述，可以分成三派，分別是：崛起國會引發戰爭、崛起國不會引發戰爭、崛起國可能會被捲入戰爭。第一派的論述包括中國威脅論以及中共如何突破中國威脅論的可能性，前者依循霸權交替模式認為中國崛起必然帶來戰爭，此一論述在 1990 年代廣為人知，後者則著重討論中共應該如何避免選擇武力戰略而導致崛起夭折；第二派亦可分為兩類，分別是「時代不同論」與「新認識論」，前者認為中共現在的崛起環境與過去霸權交替的背景不同，中共的崛起將因國際社會與互賴的制約，選擇和平的途徑，後者認為中共龐大的人口壓力會使得中共以經濟發展策略為優先，中共不會急於與美國爭霸；第三類研究的重心在於如何防範其他大國以戰爭的方式嚇阻中國崛起，與如何阻止其他勢力以各種方式將中共捲入戰爭作為課題。⁵⁵

中共在國內政治下歷經中共十六大的人事調整與 SARS 疫情的衝擊之後，正在進行一場外交政策的轉型，中國外交的轉型主要是以和平崛起與非傳統安全觀來建構其體系，並且建立新國家形象以破除中國威脅論。此面向著重在中共外交政策的

⁵³ G. Chang Goldon,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章家敦著，侯思譯嘉，**中國即將崩潰**（台北：雅言文化出版社，2002）。

⁵⁴ 李而炳，**21 世紀前期中共對外戰略的選擇**（北京：時事出版社，2004），頁 164。

⁵⁵ 閻學通，「和平崛起與保障和平——簡論中國崛起的戰略與策略」，**國際問題研究**，第 3 期（2004），pp.12~13。

產出，以及中共如何運用和平崛起的外交手段與周邊國家的互動，⁵⁶並且在其和平崛起下，此外交思維和之前中共所提倡的大國關係及新安全觀有何種關係？它背後所代表的戰略意涵為何？⁵⁷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途徑

一、研究方法

本論文研究預計以文獻分析法與歷史比較研究法為主，並在論文中重複交叉使用。

1、文獻分析法

在本論文中我們將運用書籍、期刊、報紙及網站為主要的研究資料，由於前項的研究資料多少帶有主觀的色彩及個人意見，也就是偏向第二手資料。因此我們還能運用如政府間發表的外交公報、條約原文、政府新聞稿、國防或外交報告書以及統計資料等第一手資料，以便於更能讓研究者清楚一國外交政策的原貌。筆者透過經由文獻整理及再詮釋，期盼能客觀陳述事實外，還能對提出的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或見解。

2、歷史比較研究法

研究歷史則有助於我們瞭解研究對象及題目，並且幫助我們歸納找出原因、瞭解事件經過以及對後來有無發生影響的可能，而對於本論文，歷史的研究分析法讓我們瞭解到不同時期美日安保的階段性目標及美日兩國的互動關係，並且加入另一行為者—中共，他對於當時的情況做出怎樣的情勢判斷，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此認

⁵⁶ Evan S Medeiros and M.Taylor Fravel, "China's New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Vol.82, No.6 (2003), pp.2-35.

⁵⁷ 蕭全政，「論中共的和平崛起」，*政治科學論叢*，第 22 期（2004），頁 1-4；王昆義、蔡裕明，「和平崛起：轉型中的中國國際戰略與對台戰略思考」，*全球政治評論*，第 9 期（2005），頁 43-84；于有慧，「後冷戰時代中共新安全觀的實踐與挑戰」，*中國大陸研究*，第 44 卷第 2 期（2001），62-78；邱坤玄，「結構現實主義與中共大國外交格局」，*東亞季刊*，第 30 卷第 3 期(1999)，頁 23-38；「施子中，911 事件後國際情勢發展對中共『新安全觀』之衝擊」，*戰略與國際研究季刊*，第 4 卷第 3 期(2002)，頁 1-41。

知情況又產生什麼樣的改變情況。我們運用歷史比較法，並且根據文化歷史脈絡來詮釋資料或挑戰舊有的解釋。

二、研究途徑

1、系統論研究途徑

在探討中共對美日關係的認知時，其中有幾項重要的變素我們必須澄清及理解，就是中共與美日雙方的關係並不是單面像的思考，而是呈現雙面向的動態呈現，在中共理解美日安全關係時，包含所謂的認知（perception）、力量（power）政策（policy），也就是中共會依據美日同盟關係的發展而產生認知，並且評估其雙方的力量以即形勢，並且最後做出外交決策以其因應。而如果我們想用簡單的政治學原理解釋的話，系統論將是一個很好的解釋模式，在伊斯頓（David Easton）的系統論當中，所有具政治性質的都是政治系統的構成部分，並且認為系統的形成與力量，主要來自兩類的環境因素，一為支持（support）、一為需求（demand），而這兩類構成政治系統的輸入項（input），而政治系統在經由輸入後，會有一個中間轉換的過程（conversion），而此也是一般不為人知的內幕或黑盒子，而在經由輸入和轉換過程後，系統會有一個輸出項（output），也就是做出其決策或政策的執行。並且在政策實施對環境產生影響後，又影響對政治系統的輸入，而此稱為反饋（feedback）。⁵⁸而在了解中共對美日安全關係的認知時，我們也可應用此系統論，也就是將美日安全關係當作是輸入項，而中共做為系統的本身，接受輸入項並經由反饋而有政策輸出的過程，而中共的政策又進而影響美日同盟，又再次使得美日同盟做出輸入，而整個系統達到一個循環的過程。

2、體系研究途徑

運用「分析層次」途徑來瞭解中美日三國之間的關係，首先，有關國際關係素材的系統整理方面，並不僅限於國家間的關係，舉凡跨越國家的互動，包括國家與

⁵⁸ 呂亞力，*政治學*（台北：三民書局，1999），頁 42-47。

國家之間的往來，國家與他國團體或個人的互動，甚至不同國家內任何的團體或個人彼此間的相互影響。因此，國際關係的研究領域，從題材所涵蓋的「層次」觀察，從最高的「國際層次」乃至最低的「個人層次」莫不包含在內。「分析層次」能夠成爲國際關係領域中關鍵的理論框架，除受時代背景影響外，多位學者的努力開創也是重點。首先卡普蘭（Morton A. Kaplan）在 1957 年所寫得《國際政治的系統與過程》，借用政治學中的體系理論，將國際體系區分爲權力平衡體系、鬆性兩極、剛性兩極、單位否決全球體系跟差序體系等。⁵⁹其後霍斯蒂（K. J. Holsti）在 1967 年《國際政治分析架構》一書中，列舉歷史上不同時期的國際體系分析模型，分別爲層級體系、分散型體系、分散集團體系、兩極體系及多極體系。⁶⁰而目前廣爲大家所沿用的分析架構爲華爾滋（Kenneth Waltz）在 1979 年所寫得《國際政治分析架構》三層次分析法，即個人、國家及國際三層次，並且特別著重國家在國際體系上所扮演的角色地位及權力分配。⁶¹本文最主要也是採用華爾滋所提供的分析架構爲基礎，於各章節中交互使用。

3、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研究途徑

在東北亞國際政治中，衝突與合作一直是常見的情況，而其中衝突又是大於合作的狀態，而國際關係中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一直是兩個對於國際秩序與環境有著不同見解的理論，其中新現實主義的論點強調多與現實主義相同，不外乎國家中心論、國際社會無秩序、權力政治及權力平衡者，但新現實主義運用體系結構解釋國際政治，並且強調內政與外交的聯結，重視國際政治經濟的互賴關係，並且在某些情況下，國家間也會進行合作。而新自由主義雖然接受國際體系分析途徑，更接受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不過對於國際體系的運作機制及可能發展，與新現實主義有著不同的解釋。例如新自由主義強調跨國公司及國際組織的影響力、國際建制與國際制度的作用、國家間互賴關係所產生的絕對獲益等。

而我們所採取的方法爲，如在討論國家與國家的互動關係上，所採用是較偏向於新

⁵⁹ 參閱 Morton Kaplan,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Huntington & London, 1957).

⁶⁰ 參閱 K.J. Holsti 著，譚溯澄、李偉成譯，**國際政治分析架構**（台北：幼獅出版社，2000）。

⁶¹ 參閱 Kenneth N. Waltz 著，胡祖慶譯，**國際政治體系理論解析**（台北：五南出版社，1997）。

現實主義的研究途徑，而如果涉及到國家與區域組織的互動關係上，我們則較採用新自由主義研究途徑。